

2013年冬季达沃斯论坛

热议金融监管 炮轰量化宽松

本报记者 徐惠喜



聚焦



第43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1月23日至27日在瑞士东南部小镇达沃斯举行,来自全球150多个国家的政商精英,共同把脉世界经济,商讨全球经济面临的新挑战及应对之策。加强金融监管、重构国际金融秩序,是本届年会开出的帮助世界经济重回增长轨道的良方,而肆意推行宽松政策的日本新政府和央行则遭到了与会者的集体“炮轰”。

各界齐声呼吁

加强金融监管

政界:金融贪婪行为导致危机

德国总理默克尔24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主题发言中开宗明义,高声疾呼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称如果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监管,泡沫会再次出现,这将导致全球性经济危机再次发生。默克尔指出,每一种金融产品、金融工具以及金融市场都应该得到监管,“但现在我们还远远没有做到这一点”。为此,她呼吁金融行业给予支持,帮助制定针对金融机构的监管规则。

默克尔加强金融监管的言论,得到了其他与会领导人的积极策应。英国首相卡梅伦在专题演讲中表示,现在是讨论全球日益严重的避税、逃税问题的合适时机,国际社会必须共同采取行动,整治逃税避税问题。意大利总理蒙蒂则表示,“危机产生的原因是没有成功应对金融贪婪行为”,现在应当采取行动。而稍早些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明确表示,目前对于货币市场上的各种信托机构和对冲基金等依然缺乏明确的监管规则,应该加强对金融行业的监管。

金融界:银行业需要更好的监管

国际著名投资人索罗斯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呼啸而来,它是由一个包含了信贷扩张和流行的错误概念等成分的“超级泡沫”触发的,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势在必行。他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呼吁,必须进行全新的全球金融改革,“陈旧的金融体系已经垮塌,我们需要举行新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来重新建立国际金融体系。”

在涉及如何监管问题上,瑞银集团主席艾克塞尔·韦伯则呼吁建立银行业全球统一的监管标准。他警告称,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监管标准,全球银行体系的风险会增加,“监管者将复杂的金融产品变得简单,但他们却将监管这件事情变得更加复杂,所以对于银行来说,面临一个复杂的监管体制,经营起来很不方便。”针对监管,英国保诚集团首席执行官谭天忠认为此举不可或缺,但对是否建立全球统一标准,谭天忠则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各国国情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相异,应当区别对待,对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更是如此。面对业界呼声,就连一贯倡导金融自由、反对监管的摩根大通“掌门人”杰米·戴蒙在论坛上也不得不承认,银行业确实需要“更好”的监管。

本版编辑 连俊 郝进 版式设计 邵颖 本版图片均由世界经济论坛供稿



在达沃斯年会召开之际,世界经济论坛大中国区执行董事施力伟(Olivier Schwab)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他表示,面对世界经济的持续低增长态势,各国应切实推行结构性改革,加大投资和创新力度,为持久发展注入活力。

问:世界经济论坛为何选择“为持久发展注入活力”作为本届年会的主题?

答: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缓慢,波动剧烈,危机至今仍在持续发酵。如今,各个领域的组织机构,包括企业和政府,都面临着外部冲击所造成

的空前风险。要应对这些风险,就要增加活力。与此同时,如果我们希望继续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就要加大投资和创新力度。这就是为持久发展注入活力的意义所在:既充满活力又持久发展。特别是对政府而言,这意味着要建立一种既能抵御外部冲击又能开辟经济增长新途径的机制。对企业而言,这意味着要使其组织摆脱潜在风险,同时又使其投资保持增长,活力十足。

问:2012年全球经济复苏势头减弱,发达经济体因债务问题举步维艰,主要新兴经济体增长也出现放缓。2013年全球经济应如何推动深度转型调整?

答:鉴于全球经济面临着重重困难,未来几年的关键是各国要推行结构性改革,从而走上可持续的增长道路。无论对发达经济体还是对新兴市场来说,均是如此。例如,南欧国家已在着手提高劳动力市场效率,而挖掘创新潜力仍将是至关重要的。又如,新兴市场经济体必须继续改

善其机制环境、物质基础设施和教育体系等。只有为这类改革注入新动力,全球经济才能真正开始回升。

问: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接踵而至,引发了国际社会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层次思考。你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制度目前存在的问题?

答:现存制度主要存在不完善的问题。世界经济论坛一直将此问题纳入有关国家竞争力的研究中,现今又将其列入有关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环保措施的评估中。显而易见,这对经济和社会的正常运行都意义重大。

问:新一轮技术革命有呼之欲出之势。你认为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核心是什么,又将如何影响全球经济发展?

答:过去10年,我们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创新,这些技术势必在未来几年持续发展。新材料、纳米技术、清洁能源、数字网络以及生物技术等诸多领域都会实现飞速发展。所有这些技术必将创造巨大的价值,为社会带来巨变,但也会构成挑战。世界经济论坛致力于推动人们把握机遇,应对挑战。例如在论坛的《绿色投资报告》中,我们着重强调清洁能源投资力度不足,难以满足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日本宽松政策

成为众矢之的

专家:

货币宽松带来通胀压力

如果说政府官员的表态还让日本央行留了些情面,那么达沃斯论坛上的一些专家学者对日本此举就展开了直接“炮轰”。多位专家学者在论坛上发言或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日本当前的主要问题是需求不足,而非流动性不足。日本量化宽松政策不仅难以刺激日本经济,反而会对日本经济复苏、对世界经济复苏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给亚太国家货币带来了更大的升值压力和通货膨胀压力。随着日本采取措施压低日元汇率,可能再次引发围绕货币战的争论。

索罗斯入木三分地指出,日本转向量化宽松,已经使日元贬值,而欧元更有可能升值,可能也就使德国经济放缓,有衰退可能。日本2012年的债务总额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2倍,而日本银行业是其最大债权人。日债危机将使得本国银行业陷入困境,银行业危机也将反过来加剧日本经济

的通货紧缩,并使其经济基本面进一步恶化。

舆论:

贸易赤字依旧维持

一些国际主流财经媒体也在年会期间刊文批评日本宽松政策。英国《金融时报》社论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实施新一轮货币宽松政策,有可能引发其他国家相应采取宽松措施,在主要经济体中引发一轮竞争性贬值之风,也就是所谓的货币战。该报的另一篇文章指出,日本贸易赤字从2011年的2.56万亿日元迅速增加到2012年的6.93万亿日元(770亿美元),日本央行宣布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旨在通过持续大幅印钞压低日元币值,刺激出口贸易和经济复苏。对于日本此举政策目标能否实现,该报援引巴克莱资本的两位日本资深分析师的悲观预测作了回答,称“仅靠日元贬值来恢复贸易平衡是很难的”,日本贸易赤字可能还会持续3年甚至是更长时间。



图① 经合组织秘书长格里亚出席本届论坛。

图② 英国首相卡梅伦在本届论坛发表主旨演讲。

图③ 德国总理默克尔(右)与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共同出席本届年会。

为持久发展注入活力

——访世界经济论坛大中国区执行董事施力伟

本报记者 陈建

深陷低增长、重负债、高失业困境的发达经济体,不仅没有在决策机制、增长政策、消费方式等方面作出深刻反思,反而不遗余力地推动货币政策工具创新,并在超宽松货币政策的道路上越行越远。

维护全球发展

多些责任意识

陈建

对于达沃斯年会提出的“为持久发展注入活力”这一命题,迄今为止发达经济体给出的答案似乎更多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作为最大利器;二是依靠新兴经济体继续拉动世界经济复苏。然而,真正要让世界经济摆脱当前复苏乏力的困境,发达经济体的当务之急应该是明晰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责任,坚持2009年二十国集团有关放弃竞争性贬值的承诺,为重振市场信心、促进经济增长作出同自身实力相匹配的贡献。

肇始于美国进而肆虐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可谓世界经济格局演变的重要分水岭。危机前,发达经济体为“领头羊”,而危机后主要新兴经济体则为重要引擎,对世界经济贡献率上升到50%左右。4年来,深陷低增长、重负债、高失业困境的发达经济体,不仅没有在决策机制、增长政策、消费方式等方面作出深刻反思,反而不遗余力地推动货币政策工具创新,并在超宽松货币政策的道路上越行越远。随着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竞相开闸放水,以前被称为“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量化宽松似乎已变得“常规化”。

历史经验表明,当一国经济持续低迷、债务负担难以摆脱时,该国货币政策往往表现在对内刺激通胀,对外货币贬值。如今,发达经济体着眼于己之利,一轮接一轮地推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或可为其带来暂时的好处,比如超低利率可以鼓励投资和消费,货币超发能够让财政亏空的政府获得融资,汇率降低则使其出口经济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增强优势。然而,这种短视的做法却在年会上引发了与会者的普遍担忧。

对内而言,危机国家内部的结构缺陷可能因此被掩盖,其经济仍然无法通过切实有效的结构性改革而重获竞争力。对外而言,过多流动性的注入,势必会造成大量廉价资本,扭曲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为新一轮金融风暴埋下祸根。特别是在本轮货币贬值浪潮中,具有储备货币发行国地位的发达经济体为“攻”,新兴经济体被迫处于“守”势。美元、欧元、日元等货币的大量流入将会迫使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升值,进而影响其经济竞争力,同时还将大大增加其资产价格泡沫化的风险。而如果新兴经济体采取资本管控、提高关税等应对举措,反过来又将妨碍世界经济走向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

事实上,历史上因为货币政策或者汇率问题而引发金融危机、最终导致经济受损的事例并不鲜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就曾导致多国经济严重受创。在当前形势下,一旦这种国际金融政策博弈愈演愈烈,很可能扼杀世界经济复苏的萌芽,再次造成多输的结局。

当今的国际社会正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任何以邻为壑、转嫁危机的做法均不可取。多一些对其他经济体和世界经济的责任意识,也是对本国经济负责。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在年会上所说,新的全球经济时代正在到来,在这样的时刻,国家间需要更多开放和合作,人与人之间需要更多包容和团结,同时对全球经济有影响力的人也应负起更大的责任。

视角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当今世界处于极其动荡的时期,我称之为“大过渡”时期,旧秩序在崩溃,新格局正在形成。经济上,发展中国家现已变成了全球增长的焦点;环保上,世界开始认识碳排放的风险,正走向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增长的时代;人口结构转变也正在发生,有一些社会老龄化,其他的社会非常的年轻化。更多的人口从农村移向城市,城市化加速发展。这些过渡既带来了希望又带来了不稳定性,人们面临的是新的自由和挑战。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欧元区经济正在逐渐趋稳。我们将在今年下半年看到欧元区经济复苏。我们去年出台的新购债计划对移除欧元区的极端风险非常有帮助。我们因此满意了吗?起码可以这样说,一切尚未有定论,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实体经济改善的态势,我们必须为此更加努力。目前首要目标是防止金融市场分化。

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不要认为全民健康与经济没有关系,相反,全民健康是一个国家国民生活品质的重要指标。德国政府利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契机,宣布其将连续五年为全球抗击艾滋病的科研工作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中国也在技术层面取得了不少成就,以后或许可以加入全球抗击艾滋病研发阵营。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首席执行官詹姆斯·特利:近期多种形式的保护主义都有抬头的迹象,而且存在爆发“贸易战”、“监管战”、“货币战”的风险。如果世界范围内的企业对经营、监管环境没有信心,这种政策不确定性将打击企业的投资热情。

丹麦环境大臣伊达·奥肯:环境之所以成为达沃斯年会的热点,是因为其已成为经济发展的组成部分。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两者间寻求平衡的关键,在于找到更加“聪明地”利用资源的方式,以便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创造就业机会。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政治家的勇气和商界领袖的责任感。中欧水资源交流平台建立后,双方将开展3项具体项目,涉及地下水保护、污水处理以及水资源利用效率。

(本报记者 李春霞整理)

